

# 高句丽封土石室墓文化渊源之乐浪因素初探

王培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高句丽墓葬在 4 世纪中叶前后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封土石室墓作为一种新型墓葬形式登场。由于封土石室墓出现后, 传统的积石墓仍然流行, 并在封土石室墓影响下开始由积石石圪墓向积石石室墓演变, 所以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并非是从积石墓直接演变而来, 它是高句丽不断吸收外部文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高句丽于 4 世纪初占领的乐浪、带方地区, 2 世纪后期—4 世纪中叶流行砖室墓, 而较早阶段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中, 多数型式的墓葬都承袭了诸多乐浪系统砖室墓的要素, 因此可以认为乐浪墓制在高句丽埋葬观念转变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高句丽; 乐浪郡; 墓葬制度; 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 一

高句丽是我国汉——唐时期东北地区接受中央政权册封, 但又保持相当独立性的民族政权。早在汉武帝于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之前, 文献中就已经有了高句丽之名称。《汉书·地理志》记载:“玄菟、乐浪, 武帝时置, 皆朝鲜、秽貉、句骊蛮夷。”又据《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武帝灭朝鲜, 以高句骊为县, 使属玄菟。”《汉书》中句骊与秽貉并列, 此处句骊显系族称。《后汉书》记载的高句骊县, 应来自高句丽族称, 其后的高句丽政权亦应源自族称。

高句丽政权建立于公元前 37 年。初建之时定都卒本, 即今辽宁省桓仁一带, 势力范围限于浑江流域。公元 3 年, 高句丽迁都丸都, 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 此后其势力迅速发展。《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高句骊, 在辽东之东千里, 南与朝鲜、濊貊, 东与沃沮, 北与夫余接。”此文中的“朝鲜”是沿袭旧称, 此时朝鲜故地已为乐浪郡。

乐浪郡是西汉武帝攻灭卫氏朝鲜后, 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置的汉四郡之一。《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夏, 朝鲜斩其王右渠降, 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乐浪郡设在卫氏朝鲜故地, 在今平壤市及平安南道、黄海南北道一带。武帝设立的乐浪等四郡, 在其后的昭帝时期发生

了较大的变动。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土境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省都尉官。遂弃岭东地。”汉四郡的并废使乐浪郡在西汉晚期时范围扩大，领二十五县。东汉初废都尉官后，乐浪郡失岭东七县，属县减至十八县。

汉代乐浪郡隶属幽州，汉末公孙度割据辽东，领有乐浪、玄菟郡。据《三国志·韩传》记载：“建安中（公元 196—219 年），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景初中（公元 237—239 年），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238 年魏灭公孙氏割据政权，并领有乐浪、带方郡。魏分幽州之昌黎、辽东、玄菟、乐浪、带方五郡置平州，不久又还合幽州。西晋于公元 274 年复设平州，辖乐浪、带方等郡。

汉末魏晋时期，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割据，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高句丽抓住中原及北方战乱之机不断出兵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掠夺土地、人口和财物。公元 313 年高句丽先后夺取乐浪、带方二郡，405 年高句丽最终领有了辽东、玄菟故地。427 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其统治中心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转移<sup>[1]</sup>。

## 二

西晋灭亡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东北可与高句丽抗衡的是慕容鲜卑建立的燕政权，4—5 世纪这一时期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在辽东进行了激烈地争夺，相互攻伐。320 年高句丽进攻辽东，被慕容鲜卑击溃。339 年慕容皝亲率大军伐高句丽兵至新城，高句丽王钊被迫“乞盟”，并于次年遣“世子”朝燕。341 年慕容皝再次进攻高句丽，烧其宫室，毁丸都而归。385 年高句丽王伊连攻取辽东、玄菟二郡。公元 400 年，后燕发兵攻高句丽，夺二城，拓地七百余里，掠其居民五千余户而还。此后，高句丽与后燕为争夺辽东的控制权而征战不休，直至北燕建立<sup>[2]</sup>。总之，4—5 世纪时，高句丽主要忙于同鲜卑族势力争夺辽东，战事频繁。慕容皝对高句丽的打击，使其险些灭国。因此高句丽在占有乐浪、带方地区后，一时无暇顾及向这一地区发展势力。乐浪、带方故地在 5 世纪以前，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故有的汉文化传统得以继续保持和发展。这一点在墓葬中表现为原郡县地区传统的砖室墓继续流行，墓主人使用原郡县或东晋所授官职表记身份，墓砖纪年均使用东晋或中国北方政权的年号等。

目前，年代明确属于高句丽占有乐浪、带方郡以后的乐浪系统砖室墓有路岩里石盖顶砖室墓、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带方太守张抚夷墓等。在原黄海道各地出土的 4 世纪纪年铭文墓砖表明，这一地区还应存在更多数量的乐浪系砖室墓。

西北朝鲜地区出土公元 4 世纪纪年铭文墓砖一览表<sup>①</sup>。

墓 砖 铭 文	出 土 地 点	公 元 纪 年
太安二年 ……	黄海道信川郡土城里北新洞	西晋惠帝太安二年为公元 303 年。
永嘉□年 ……	黄海道信川郡南部面书院里	西晋怀帝永嘉存六年，即公元 307-312 年。
建兴四年会景作造	黄海道	西晋愍帝建兴四年为公元 316 年。
泰宁五年三月十 ……	黄海道信川郡龙门面福隅里二号墓	并无“泰宁”年号，东晋明帝有“太宁”共存三年，太宁五年为成帝咸和二年，即公元 327 年。
咸和十年大岁乙未孙氏造	黄海道信川郡信川面社稷里	东晋成帝咸和共存九年，十年应为咸康元年，即公元 335 年。
建武九年三月三日王氏造	黄海道信川郡	后赵石虎建武九年为公元 343 年。
建元三年大岁 …… 在巳八月孙氏造	黄海道信川郡龙门面福隅里	东晋穆帝建元仅存二年，建元三年为永和元年，即公元 345 年。
大岁在戊渔阳张抚夷砖 大岁申渔阳张抚夷砖	黄海道凤山郡文井面胎封里第一号墓	将“戊申”换算为公元 348 年较为妥当。
建武十六年大岁在 ……	黄海道信川郡龙门面福隅里八号墓	后赵石虎建武共存 14 年，建武十六年为石鉴青龙元年，即 350 年。
永和八年二月四日韩氏造砖	黄海道信川郡北部面	东晋穆帝永和八年为公元 352 年。
永和九年三月十日辽东韩玄菟太守领佟利造	平壤站内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为公元 353 年。

<sup>①</sup>表中资料引自梅原末治：《朝鲜北部出土纪年砖集录》，《支那学》七卷一号，1933 年，121-128 页；榎本龟次郎：《乐浪带方郡时代纪年铭砖集录》，《昭和七年度古迹调查报告》第一册，朝鲜总督府，1933 年，附录 1-8 页。

元兴三年三月廿日王君造	黄海道信川郡北部面西湖里	东晋安帝元兴三年为公元 404 年。
建始元季韩 …… 元季韩氏造砖	黄海道信川郡龙门面福隅里五号墓	后燕慕容熙建始元年为 407 年,慕容详建始元年为公元 397 年。

通过上表列举纪年铭文墓砖所示年代范围,可以认为乐浪系砖室墓至少应延续至 4 世纪中叶,甚至可到 5 世纪初。又据田村晁一引《梅原考古资料》介绍,在黄海道信川郡调查的福隅里墓群,年代范围可推定为 4 世纪初——5 世纪初阶段。

福隅里墓群位于黄海道信川郡龙门面福隅里东面一低矮山冈的南麓,东西向排列 10 座砖室墓。1928——1930 年的调查发现了“高”、“富贵”、“司马”、“平民”、“韩氏造砖”等铭文砖及纪年砖。其中二号墓纪年砖铭文为“泰宁五年”,八号墓纪年砖铭文为“建武十六年”,五号墓纪年砖铭文为“建始元季”<sup>[3]</sup>。据上表“泰宁五年”可推定为公元 327 年,“建武十六年”应为公元 350 年,建始元年为公元 397 年或 407 年。因此福隅里墓群的建筑年代大致是在 4 世纪初——5 世纪初,表明原郡县地区被高句丽占领后一定时期内仍然继续大规模营造传统的砖室墓。

路岩里砖室墓位于黄海南道安岳郡路岩里,墓室前壁平直,侧壁和后壁向外弧,穹窿墓顶,上盖大石板,墓门开在前壁中央,有砖筑甬道;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佟利墓),位于平壤火车站内,墓室端壁平直,侧壁向外弧,穹窿顶,上部使用石材砌筑,墓顶盖大石板,墓门偏向左侧,有砖筑甬道<sup>[4]</sup>。路岩里砖室墓和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其墓葬形制与乐浪郡时期单室砖室墓的晚期型式(B1 型 III 式)相同<sup>②</sup>。路岩里砖室墓墓砖有“建武八年正邑太守”、“正邑太守张君尊”铭文,在黄海南道信川郡也曾出土过后赵建武年号铭文墓砖,后赵建武八年应为公元 342 年。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墓砖有“永和九年三月十日辽东韩玄菟太守领佟利造”铭文,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为公元 353 年。

带方太守张抚夷墓(胎封里第一号墓)位于原黄海道凤山郡文井面胎封里(今黄海北道沙里院市)。墓室砖筑,平面呈方形,四壁向外弧,穹窿顶,墓门开在南壁中央,前面有较长的砖筑甬道,甬道两侧开设耳室<sup>[5]</sup>。该墓墓砖有“大岁戊在渔阳张抚夷砖”、“大岁申渔阳张抚夷砖”、“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等铭文。关于带方太守张抚夷墓所出“大岁戊 ……”,“大岁申 ……”铭文砖所示干支纪年,有将“戊申”换算为公元 288 年、348 年及 408 年诸说。墓砖铭文中的“大岁 ……”

<sup>②</sup>有关乐浪砖室墓的类型学分析,请参见王培新:《公元 2——4 世纪西北朝鲜地区砖室墓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网络版) 2003-1,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在线期刊。

表记方式，与黄海道信川郡信川面社稷里出土的“咸和十年大岁乙未孙氏造”及同郡龙门面福隅里出土的“建元三年大岁···”铭文砖、黄海道信川郡龙门面福隅里八号墓“建武十六年大岁···”铭文砖等4世纪前半期的砖铭表记方式相同。因此将“戊申”推定为公元348年较为妥当<sup>[6]</sup>。带方太守张抚夷墓的墓室构造、墓砖形状及花纹都与乐浪砖室墓相同，“带方太守”之职，可能是东晋政权授予墓主人名义上的封号，“渔阳张抚夷”证明墓主人为原乐浪、带方郡的汉民，因此该墓无疑属于乐浪砖室墓系统。

乐浪地区砖室墓出现于东汉后期，魏晋时迅速普及。墓室壁面向外弧凸，穹窿式藻井结构是乐浪系砖室墓的突出特征。乐浪系统砖室墓的晚期，单室墓侧壁外弧，端壁已变得平直，墓门偏向一侧。此时的砖室墓开始使用石材砌筑墓室的顶部，用石板封盖墓顶，有的墓葬还在墓室底面和墙壁涂白灰，个别墓葬有壁画遗迹<sup>[7]</sup>。

### 三

高句丽占领乐浪地区后，其传统文化必然与原郡县地区的汉文化发生碰撞，相互学习与影响。高句丽墓葬由积石墓向封土石室墓的转变，大约发生在4世纪中叶前后。高句丽墓制的这种变化，是在乐浪和辽东地区的影响下逐步完成的<sup>[8]</sup>。

在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前，高句丽的统治中心仍然是以集安为中心的鸭绿江中游地区。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以石材构筑墓室，顶部有藻井结构，坟垄整个以黄土培封。少数墓葬墓基四周以石筑坛，有的筑成一级方坛，有的则筑成二级阶坛。近年的考古发掘还确认了一座筑有阶坛的砖室墓。这类墓葬一般都具有相当规模，墓室比较高大，已发现的壁画墓多属此类。根据其平面形状、藻井结构和壁画内容的分析，其年代应在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sup>[9]</sup>。

集安地区年代较早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墓室结构以甬道两侧构筑耳室的单室墓为主，少数为长方形墓室甬道偏向一侧的所谓“刀形墓”。墓室顶部筑成穹窿式、四阿式或多层叠加小抹角藻井。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有万宝汀1368号墓、山城下332号墓、山城下983号墓、长川2号墓、禹山3319号墓、通沟12号墓、折天井墓、角觥墓、舞蹈墓等。这些墓葬的年代约当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

万宝汀1368号墓位于集安洞沟古墓群万宝汀墓区西部。墓室呈长方形，四壁向内倾斜，往上急剧内收，四角圆缓转成弧形，其上以石盖顶。墓门开于南壁东侧，甬道的外侧较敞，用三块石板盖顶，墓内遍抹白灰，上以墨色影作木结构梁柱<sup>[10]</sup>。万宝汀1368号墓的壁画作法见于通沟12号墓南室，墓中石灶的造与麻线沟1号墓、长川2号墓的陶灶相似，该墓具有高句丽封土石室墓的初期特征，年代应为4世纪后半期至5世纪初。

山城下332号墓位于集安洞沟古墓群山城下墓区中部。墓室近方形，穹窿式

藻井，墓门设在墓室南壁中央，甬道两壁微向内倾，上以三块大石板盖顶，甬道的两侧各设一长方形耳室，墓室、甬道、耳室的表面均抹白灰，主室四壁及藻井绘有壁画，内容有云纹、王字纹、影作墨色梁枋、莲花、骑射等<sup>[11]</sup>。与山城下 332 号墓墓室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墓葬还有山城下 983 号墓、麻线沟 1 号墓、长川 2 号墓、通沟 12 号墓南室、折天井墓等。按日本学者东潮的高句丽文物编年研究，山城下 332 号墓出土铜带饰的年代为 4 世纪中叶<sup>[12]</sup>。

禹山 3319 号墓位于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西部。墓室建筑在石砌三级方坛之上，过去认为该墓为方坛阶梯积石墓或方坛阶梯石室墓。1997 年对该墓进行了清理，知其为一座墓室构造与带方太守张抚夷墓完全相同的阶坛砖室墓。该墓墓室呈方形，四壁外弧，采用丁砖平侧错缝（三顺一丁）砌法。甬道向西，两侧有耳室，墓室、耳室顶部均已坍塌，在墓室东北角发现砖壁曾抹白灰，上残存有赭红色，应为壁画痕迹<sup>[13]</sup>。20 世纪 60 年代对该墓进行调查时在墓侧采集到一件灰色卷云瓦当，上有“太岁在丁巳五月廿四日”铭文。1979 年又在墓道处出土一件青瓷盘口壶，器形与南京地区东晋前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器形相同，为南方瓷窑的产品<sup>[14]</sup>。据出土青瓷盘口壶器形及瓦当纪年铭文的“太岁···”表记方式推断，该墓的年代应在东晋前期。因此将“丁巳”干支纪年换算为公元 357 年为妥。

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载宁江流域（乐浪故地），4 世纪前期开始出现封土石室墓。平壤一带的封土石室墓，墓室多修建于地下或半地下，年代较早的墓葬还使用长方砖铺地、砌棺床。平壤一带 4 世纪——5 世纪初的封土石室墓主要有贞柏洞 101 号墓、平壤站前二室墓、台城里 2 号墓、伏狮里墓葬、龛神冢、药水里墓、安岳 3 号墓、台城里 1 号墓、辽东城冢、德兴里壁画等。

贞柏洞 101 号墓位于平壤市大同江南岸的乐浪区。墓室长方形，甬道偏置于南壁东侧，墓室及甬道地面铺砖，四壁和甬道以石材垒砌，墓室墙壁涂白灰，室内有砖筑棺床。朝鲜学者认为：贞柏洞 101 号墓铺地砖在形状、质地、颜色、纹饰上以及棺床的修建方法上都与砖室墓完全相同，从墓室平面形状和甬道位置等方面可以说是继承了先行砖室墓的特征。该墓与砖室墓处于同一墓区内，而且出土的鎏金耳饰和乐浪洞 27 号砖室墓出土的耳饰形制相同，因此贞柏洞 101 号墓建造年代应与晚期砖室墓同时<sup>[15]</sup>。如前所述，以平壤为中心的西北朝鲜地区砖室墓传统延续至 4 世纪中叶，因而贞柏洞 101 号墓的年代应在 4 世纪前半期。

平壤站前二室墓（平壤站前壁画墓）位于平壤火车站东北，西距佟利墓约 500 米。墓室建于地下，由前后二室组成，二室平面均略呈方形，壁体使用仿砖形变质花岗岩石条砌筑，后室四壁外弧，墓壁逐渐内收，推测为穹窿式藻井。前室左右两侧壁设有壁龛，墓门开在前室南壁中央，有长甬道，墓室及甬道地面铺砖，墓室壁面涂白灰，并绘有人物生活图内容的壁画<sup>[16]</sup>。平壤站前二室墓墓室构造、建筑方法及墓底铺砖的做法都与砖室墓相同，因此将其年代推定为 4 世纪前半期的观点应是符合实际的<sup>[17]</sup>。

台城里 2 号墓位于平安南道南浦市台城里。墓室呈长方形，侧壁外弧，南端两侧设有壁龛，四壁向内倾斜，往上内收，墓门偏向一侧，有长甬道，壁画内容为人物及影作木结构梁柱<sup>[18]</sup>。台城里 2 号墓与万宝汀 1368 号墓均为长方形单室封土石室墓，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基本相同，两墓的年代接近。

伏狮里壁画墓位于黄海南道安岳郡伏狮里。墓室呈方形，穹窿式藻井，墓门外侧有长甬道，甬道两侧设有耳室，壁画内容为人物、星云、莲花<sup>[19]</sup>。

龕神冢位于平安南道南浦市（旧龙冈郡新宁面）。由长方形前室和方形后室组成，穹窿式藻井顶部加抹角叠涩，前室两侧壁设有壁龛，壁画内容为人物生活图<sup>[20]</sup>。伏狮里墓和龕神冢从其墓室构造、壁画内容等方面分析，年代在 4 世纪后期——5 世纪初<sup>[21]</sup>。

以上列举的 4 世纪——5 世纪初集安和平壤一带的封土石室墓，墓葬形制与乐浪系砖室墓极为接近年代前后衔接，在墓室构造及建造方式上许多方面都承袭了砖室墓的要素，所以高句丽封土石室墓文化渊源之一应在乐浪地区。

贞柏洞 101 号墓、台城里 2 号墓、万宝汀 1368 号墓为长方形墓室甬道偏向一侧的单室封土石室墓，墓室构造与佟利墓相近，此种形制的封土石室墓文化渊源应来自乐浪 B1 型 III 式砖室墓。

伏狮里壁画墓、山城下 332 号墓、禹山 3319 号墓、山城下 983 号墓、通沟 12 号墓南室、长川 2 号墓等为方形墓室甬道两侧设耳室的单室封土石室墓，墓室构造与带方太守张抚夷墓相同，禹山 3319 号墓砖室构造几乎与带方太守张抚夷墓如出一辙，建筑年代比张抚夷墓晚九年，两者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显而易见。

平壤站前二室墓、龕神冢、药水里墓为前室两侧设有壁龛的二室墓，形制与乐浪 C2 型砖室墓接近。C2 型砖室墓有的前室两侧设有侧室，而乐浪 C 型砖室墓的前室和侧室都有逐渐退化的演变趋势<sup>[22]</sup>。平壤站前二室墓及龕神冢前室所设壁龛，有可能是 C2 型砖室墓侧室退化的结果。平壤站前二室墓墓室及甬道地面铺砖，壁体使用仿砖形石条砌筑，后室四壁外弧，这种建筑形式显系承袭了砖室墓的建筑风格。

高句丽墓葬大致分为积石墓和封土墓两类。总体上来看，积石墓年代早，代表着高句丽固有的墓制。封土墓年代较晚，是高句丽不断吸收外来墓制的结果。早期积石墓在上部筑石圻，墓中很少有随葬品，只在墓圻中见有铁镬和烧熔了的石块、烧过的碎骨。铁镬表明石圻中原有木椁之类的装殓设施，火烧痕迹反映火葬习俗。后来流行的封土石室墓，墓室内有棺床，发现有木棺痕迹，出土棺钉、棺环，有的墓葬还保留着相当完整的人骨架。积石墓和封土墓之间不只是建造材料和技术方面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埋葬观念。积石墓是让死者在焚灭中升腾的高坛，封土墓则是让死者在冥冥中安眠的墓室。由积石墓向封土

墓的过渡，标志着高句丽葬俗的重大改变，这当是高句丽逐渐接受中原埋葬制度的结果<sup>[23]</sup>。

#### 四

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大约于公元4世纪中叶前后，在以集安为中心的鸭绿江流域和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先后发生。封土石室墓流行的早期阶段（4—5世纪初），高句丽政治中心还在集安地区。自东汉以来高句丽政权一直以集安为都，浑江、鸭绿江流域又是高句丽族的发源地，这一地区高句丽固有的积石墓传统根深蒂固。平壤一带是高句丽占领乐浪、带方郡后新开辟的领域，这里有着长达四百余年的郡县制统治，早已被纳入了汉魏晋文化的分布区之中。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在接受乐浪墓制过程中两地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在集安地区，与封土石室墓出现的同时还传入了砖室墓，早期的封土石室墓也只有单室墓。砖室墓和方形墓室甬道两侧设耳室的单室封土墓中还有建造石筑方坛或阶坛的形式，如禹山3319号墓、通沟12号墓、折天井墓<sup>[24]</sup>。通沟12号墓有南北两个石室，各有墓门和甬道，这种同封异室合葬的形式，在平壤一带是不见的。石筑方坛、阶坛是积石墓特有的结构，集安地区早期封土石室墓砌筑石坛是高句丽传统墓制与新兴墓制有机结合的表现。横穴式的室墓传入集安地区后，不仅使高句丽墓葬出现了砖室墓和封土石室墓，而且也使传统积石墓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改变。封土石室墓在集安地区出现时，积石墓的内部设施开始由石圪向石室演变。4世纪中叶—5世纪初，集安地区积石墓在内部设施上接受了新兴的室墓要素，而封土墓又部分地采纳了固有积石墓的外部特征。

平壤一带的封土石室墓，出现时间要略早于集安地区，墓葬形制也较为多样，除了乐浪文化因素以外，还可看到辽东墓制的影响。此外，这一地区年代较早的封土石室墓还能够见到较多的砖室墓要素。例如墓室建于地下或半地下，多采用穹窿式藻井，墓室墙壁向外弧，地面铺砖，设砖筑棺床，使用砖形石材砌筑墓室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朝鲜学者在平壤大同江南岸的乐浪区发掘了千余座砖室墓和封土石室墓，从大量引用这部分资料对砖室墓及封土石室墓进行研究的朝鲜学者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乐浪系砖室墓对这一地区高句丽封土石室墓的产生有着更为直接地影响<sup>[25]</sup>。

在集安地区封土石室墓出现后，传统的积石墓仍然流行，并在封土石室墓影响下开始由积石石圪墓向积石石室墓演变。而平壤一带的早期封土石室墓又表现出与本地先行砖室墓之间的密切渊源关系。因此可以基本上认定，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并非是从积石墓直接演变而来，这是高句丽不断吸收外部文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高句丽早期封土石室墓的多种型式，都可以从乐浪系砖室墓中找到其文化渊源关系，而且高句丽封土石室的初始年代恰好与乐浪系砖室墓的终末期相衔接，由砖室墓向封土石室墓的过渡类型也越来越多地被发现，这都充分反映出乐浪墓制在高句丽埋葬习俗转变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 耿铁华. 中国高句丽史[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172-210.
- [2] 同注[1].
- [3] 田村晃一. 朝鲜半岛北部的砖室墓(日文)[A]. 论苑考古学[C]. 东京:天山舍, 1993. 709-736.
- [4] 野守健, 榎本龟次郎. 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调查报告(日文)[R]. 昭和七年度古迹调查报告(1). 朝鲜总督府. 1933. 韩仁德. 路岩里石盖顶砖室墓(朝鲜文)[J]. 朝鲜考古研究, 2003, (3): 35-40.
- [5] 朝鲜总督府. 朝鲜古迹图谱(日文)[M](1). 1915. 37-42; 谷井济一. 黄海道凤山郡·平安南道顺川郡及平安北道云山郡古迹调查略报(日文)[R]. 大正六年度古迹调查报告. 朝鲜总督府. 1920. 579-581.
- [6] 同注[3].
- [7] 王培新. 公元2—4世纪西北朝鲜地区砖室墓初步研究[J/OL]. <http://www.sinoss.com/zh-cn/index.jsp>, 2003-5-20/2003-7-10.
- [8] 魏存成. 高句丽考古[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 84.
- [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博物馆. 洞沟古墓群1997年调查测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9-15.
- [10] 李殿福. 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J]. 考古, 1983, (4): 308-314.
- [11] 同注[10].
- [12] 东潮. 高句丽考古学研究(日文)[M]. 东京:吉川弘文馆. 1997. 402-415.
- [13] 同注[9].
- [14] 耿铁华, 林至德. 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J]. 文物, 1984, (3): 55-63.
- [15] 李淳镇. 关于乐浪区一带的高句丽石室封土墓[J]. 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 1992, (1): 57-64.
- [1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考古学及民俗学研究所. 大同江流域古坟发掘报告(朝鲜文)[R]. 考古学资料集(1). 平壤:科学院出版社. 1958. 17-24.

- 
- [17] 朴晋煜. 高句丽壁画墓类型演变和编年的研究[J]. 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 1998. (1): 38—45.
- [1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考古学及民俗学研究所. 台城里古坟群发掘报告(朝鲜文)[R]. 遗迹发掘报告(5). 平壤: 科学院出版社. 1959. 102-108.
- [19] 田畴农. 黄海南道安岳郡伏狮里壁画古墓(朝鲜文)[R]. 考古学资料集(3). 平壤: 科学院出版社. 1963. 153—161.
- [20] 朝鲜总督府. 朝鲜古迹图谱(日文)[M](2). 1915. 140-146.
- [21] 同注[12]. 119-199.
- [22] 王培新. 乐浪墓葬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02.
- [23] 同注[9]. 24.
- [24] 王承礼, 韩淑华. 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J]考古, 1962. (2): 67-72; 孙仁杰. “折天井”墓调查拾零[J]. 博物馆研究, 1988. (3): 74-75.
- [25] 同注 17.

## Lelang cultural elements in Koguryo earth-covered tomb

WANG Pei-xin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e Koguryo earth-covered tomb emerged in the middle 4 century A.D. This kind of tomb did not evolved directly from the traditional Koguryo stone tomb. It's emergence was due to the Lelang culture.

**Keywords:** Koguryo earth-covered tomb; Lelang cultural elements

**收稿日期:** 2004-2-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3 年度博士点基金(03JB780001)资助。

**作者简介:** 王培新(1957-), 男,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